

SISTERS IN LAW



温柔的正义

How
SANDRA DAY O'CONNOR
and
RUTH BADER GINSBURG
went to the Supreme Court and
CHANGED THE WORLD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如何改变世界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美] 琳达·赫什曼 / 著
(Linda Hirshman)
郭烁 / 译





溫柔的正义

李國威及林奕華合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SIS
IN
LAW

[美] 琳达·赫什曼 (Linda Hirshman) / 著 郭烁 / 译

温柔的正义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如何改变世界

How

SANDRA DAY O'CONNOR

and

RUTH BADER GINSBURG

went to the Supreme Court and

CHANGED THE WORLD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北京市版权局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3255 号

SISTERS IN LAW © 2015 by LINDA HIRSHMA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Kuhn
Projects LLC, through The Artemis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柔的正义：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如何改变世界 / (美)
琳达·赫什曼 (Linda Hirshman) 著；郭烁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2

书名原文：Sisters in law:how Sandra Day O'Connor and Ruth Bader
Ginsburg went to the Supreme Court and changed the world
ISBN 978-7-5093-9109-9

I. ①温… II. ①琳… ②郭… III. ①最高法院—法官—司法制度—
研究—美国 IV. ①D97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3180 号

责任编辑 / 胡 艺 (ngaihu@gmail.com) 周焜希

封面设计 / 蒋 怡

温柔的正义

WENROU DE ZHENGYI

著者 / [美] 琳达·赫什曼

译者 / 郭 烁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张 / 12.75

字数 / 398 千

版次：2018 年 2 月第 1 版 /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3-9109-9

定价：58.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100031

网址：<http://www.zgf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010-66033393

传 真：010-66031119

编辑部电话：010-66034985

邮购部电话：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电话：010-66032926)

献给我的姐姐，朱迪思·R. 科伦，1948年开始启蒙我阅读，
一直陪伴我的成长；

献给我的女儿，费城律师莎拉·夏皮罗，还有我的外孙女
西尔维和悉尼，感恩她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

代序

她们配得上“伟大”的字眼

孟宪范^①

这是一部使人感奋的书。

关于这本书，作者赫什曼在本书导言中的两句话可做概括：两位主人公奥康纳和金斯伯格，是“推行男女平等的先驱”；该书“讲述了站在司法权力顶端的她们，如何共同使女性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当前，我国妇女维权正面临大量新的问题，译介这两位为男女平权努力奋斗的当代大法官，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伟大的代价是责任

两位先驱不凡的奋斗精神让我再次体会到伟大和责任的关系。丘吉尔1943年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有一句名言：“伟大的代价是责任（The price of greatness is responsibility）。”这句话凝聚着他的人生体验。在这次演讲之前的1940—1941年，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带领人民取得了英德大规模空战——不列

^① 孟宪范，女，1942年生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颠战役的胜利，使得德国不得不放弃入侵英国的作战计划。不难想象，丘吉尔说出这句话时他胸中汹涌的波涛。推而广之，想想那些在人类历史上作出非凡贡献的人，哪一个不是体悟到自己身负更多的责任呢？这类责任的具体内容虽然千差万别，但无一不具有超越个人的内涵。可以说，一个人对自己身负的责任感悟到什么程度，他的努力就可能达到什么高度。

我们看到，居于最高法院大法官高位的奥康纳和金斯伯格，是如此自觉地担负起为女性争取与男性同等权利的责任，使得这种责任在她们心中有如信仰，坚定而执着。她们配得上“伟大”的字眼。

金斯伯格的下面三件事突出体现了这种坚定执着的精神。一是进入最高法院前的1970—1980年的十年间，她参与了300多个性别歧视案子，并且将六个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并亲自辩护，赢了其中五个，在既定的宪法框架下，将现有的法律推到了极致，最大限度地打击了针对女性的歧视。二是通过十年的诉讼，金斯伯格最终做到了性别歧视适用违宪审核标准的“中级审查标准”，将以法律保障女性权益的进程推进了一大步——1868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公民权利的平等法律保护条款最初禁止的是种族歧视，却并不禁止性别歧视。三是当庭宣读异议意见书。2005年奥康纳退休后，金斯伯格失去了最坚固的同盟，无法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来实现她想要的社会正义。在这样的情况下，金斯伯格采取了当庭宣读她的异议意见书这一方式来表达她的不同意见。这种方式是在多数判决宣读完毕后，在媒体的瞩目下宣读自己的异议意见书。显然，这是一种激烈的反对方式，她公开宣布自己与大法官的多数判决意见相左，并认为多数判决是绝对错误的。

如果说前两件事中金斯伯格如同战士的话，后一件事中她则如同勇士。什么是先驱？先驱是在开创性理想的感召下，突破现有体制，致力于前人未曾做过的事业的人。为此，他们必是怀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去披荆斩棘。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金斯伯格赋予了自己推进男女平等的历史责任，不怕孤独，不畏挫折，不屈不挠。她配得上“伟大”的字眼。

道阻且长

作为中国读者，我最大的一个感触是“道阻且长”。试想，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对人权有许多美丽的承诺，而美国妇女在一百多年后的1920年才取得选举权；为了争取女性进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平等机会，金斯伯格公布的最高法院针对美利坚合众国诉弗吉尼亚一案的判决，则是在1996年。这一年，距离《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发布已经有二百多年。试想，这其中的时间距离是以百年为单位，真可谓“道阻且长”！

回望中国，困难可能更为突出。一方面，我们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并且2005年重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更是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写入法律：“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另一方面，我们有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历史，有与其相应的儒家学说，其“三纲”中的“夫为妻纲”还为性别歧视提供了充足的伦理依据。因此，面对这一两千年的传统，清除性别歧视恶习就更是“道路阻且长”了。何况，法律的实施从来就不像“水之就下”那么容易。法律规范只是一种应然状态，它规定的是抽象行为模式；而事实证明，由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由抽象行为模式变成人们的具体行为，不会一蹴而就。具体来说，一个新法的确立，是对既有权利格局的改变，这就意味着，要想使其真正得以实施，需要社会有相应的系统变化，包括结构性变化，以及人们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的变化。因此，法定权利的实现并不简单。

我国的1954年宪法已经颁行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今天，这些法条的落实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在女性的经济权益上，最近的土地确权中，一些地区农村妇女因婚姻变迁而出现的土地两头落空等情况未能得到解决，仍然有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在确权中“消失”；女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更是常见。而在文化生活上，问题则更多。其中，我们周围无处不在的传媒，充斥着的是男权文化，是它对女性的集体想象，其核心是不把女性看作平等的主体，而是供其消费的客体，如将女性躯体商品化，夸大女性年轻美貌的外在价值，屏蔽女性的内在价值，在消费文化的狂欢中误导女性甘于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使其失去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进一步说，这类文化垃圾的存在本身倒还不令人忧虑，使人忧虑的是，这类文化垃圾竟然可以长期大行其道，人们对它习焉不察。商家追求利润，影视追求投资回报，媒体要谋利，但这些都应当有底线。我们急需一个倡导和监督机制来遏制越线行为。

既然这样，我们就需要一大批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式的、以真正实现男女平权为信仰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共同构建有效推进男女平权的机制，希望不要再用百年作为进展的时间计量单位了！

郭烁译书的联想

郭烁作为男性翻译这本书，初闻有点意外，继之又有些感动。我们一直欢迎女性研究领域有男性加入，他们对问题的独特体悟不但可以提供宝贵的视角，而且这本身就是男女两性携手发展的一种具象。进言之，我们推进使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不是为了使两性对立起来，而是为了两性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美美与共”。郭烁这个年轻的男性学者关注女性问题，真是让人感到振奋。

郭烁这个青年才俊，平时中文文字才情斐然，不乏灵动幽默之笔；该书译笔流畅，也很难得。当今中文翻译问题不少，除去“常凯申”之类知识性的错误，因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中西文句子长短、结构的不同，翻译时需要调整一些句子成分的位置，这就要弄清句子内部的逻辑关系，还要符合中文表达的习惯，避免晦涩难懂的“翻译腔”。所以，真真是“译事不易”。而好的译文不仅要看译者的专业知识，还要看其母语的水平。所以，该书文字的流畅足见译者的功力，何况其中还时不时会冒出一些神来之笔。我还知道，郭烁为书中某些用语的汉译颇费心思，还曾请教他人，力求其“信”，这也是需要点赞的。

我自20世纪90年代写作若干研究女性的作品，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多少接触了女性研究。不过，近来关注的重点已经在其他领域，现在为这样一本描写当代女性法学家的作品作序，本想推辞，但既然郭烁一再坚持，我就勉为其难，心想也好，可以因此梳理一下自己这些年来有关女性问题的若干想法。而没有想到的是，为写序言进行的阅读，使我对美国争取男女法律权利平等的历史，以及两位伟大先驱的生命轨迹和精神有了认识，并深受教益。为此，我得感谢郭烁。

郭烁是我退休之后才到我原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就职的，其实我们并无工作交集，但阴错阳差的机缘，使他和我们一帮杂志社退休的老朋友打成一片，周游四海，是年轻人中的异数。他的学术—语言功力和公益心，让我有什么文字上的事情，常常不讲理地交给他来做。他现在到了北京交通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我们的交流反倒更多。

时代不同了，年轻学人思路开阔，外语过关，透过郭烁的微信朋友圈能看到全世界的风景，也是我退休生活的一桩乐事。他取得的任何成绩我们都愿意鼓掌，当然包括这本两位伟大女性大法官合传的出版。

是为序。

序幕：荷叶领

每年7月4日，举国欢庆这个民主国家诞生的时候，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大多已经出了远门。但在为夏季休庭而离开首都之前，他们必须先对去年10月以来业已受理的所有案件作出判决。最高法院并非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旦它强令社会做出重大改变，这样的案件就最为棘手也最具争议性。所以，类似的案件常常留到最后处理。时间嘀嗒流逝，在6月的最后几个判决日里，法庭上的紧张气氛犹如华盛顿夏天的空气一般，燥热而沉重。

1996年6月26日上午，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立以来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穿过法官席后的红色天鹅绒垂帘，坐在最靠外的座位上。座椅排成一条庄严的曲线，五张椅子开外，坐着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大法官——1981年被任命的、联邦最高法院创建以来的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或者像她调皮地称呼自己那样，叫作FWOTSC（First Woman on the Supreme Court）。每位女法官都穿着配有白色荷叶领装饰的暗黑色法袍。^①除此之外，第一和第二位女法官之间的联系并不比其他法

^① William Peacock, "Friday Frills: The Jabot (or Neck Doily)," *Findlaw Supreme Court*, February 7, 2014, http://blogs.findlaw.com/supreme_court/2014/02/friday-frills-the-jabot-or-neck-doily.html.

官之间的更多。然而就在那一天，公众有幸目睹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女性的共同点。

金斯伯格大法官从那超过她瘦小身材的高背椅深处，公布了法庭针对美利坚合众国诉弗吉尼亚一案（United States v. Virginia）的判决。^①自1996年6月的那个早上之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这个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就已经训练了不少男性学员的军校，必须将女学生也纳入招生范围。

xi 美国宪法要求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都应当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让女人住进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营房里；让女人参加传统的戏谑项目，在泥潭里打滚；让女人剪短头发穿上硬挺的灰色制服，这让她们看起来就像一个世纪前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派往南北战争战场的南方士兵那样诡异。金斯伯格的六个大法官同僚支持了她的意见——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必须招收女兵。然而比起这七张绝对多数赞同票，该案本身更具争议性，影响也更为深远。直到那一天，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早已是世界区分男女各自角色的重要象征。在这个案子被送到最高法院之前，下级法院已经支持了该学院的性别隔离制度。多年来，女权主义的反对者一直以军事设置这一背景作为他们的主要论据，论述如果真的像对待男人一样平等对待女人，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荒唐。该学院是男女区别对待的最后堡垒之一。现在的大法官金斯伯格，几年前作为律师，就已经是性别平等的首要倡导者——“女权运动的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将判令人们活在一个勇敢的性别平等的新世界。

金斯伯格的姐妹奥康纳决定由她在庭上发言，在场旁听的人几乎不知道这一点。经过法官会议上的投票，多数法官投票赞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应该接纳女性学员。之后，多数派法官中资格最老的法官有权指定任何一名多数法官撰写该方法庭意见。他指派资深女性大法官桑德

^① 518 U.S. 515 (1996), http://www.oyez.org/cases/1990-1999/1995/1995_94_1941.

拉·戴·奥康纳完成，但她并不接受。她知道在1970年到1980年间，是谁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①效劳，经常作为律师出现在最高法院，是谁在努力促使最高法院号召性别平等。而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这非鲁斯莫属。”她这样说道。^②

在判决当日，大法官们不会宣读通常长达几十页的完整的法庭意见书。当天早上，金斯伯格决定在她当庭宣读的梗概意见中引用奥康纳在1982年针对霍根诉密西西比州（Hogan v. Mississippi）一案中的法庭意见，将其中关于禁止密西西比州在州立大学护理学院进行性别隔离的做法作为参考。金斯伯格提醒旁听者注意，奥康纳在霍根一案的法庭意见书确立了这样一个规则——各州不能“基于男女之间角色与能力不同的固有观念，而（对特定人群）关上大门”。这位传奇而含蓄的大法官在此处稍作停顿，从意见书上挪开视线，与她的前辈对视了一下。她想到这两份判决意见的契合点，点了点头，^③继续宣读法庭意见书。

xii

①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简称ACLU），是一个美国的大型非营利性组织，总部设于纽约市，其目的是“捍卫和维护美国宪法和其他法律赋予的、这个国度里每个公民享有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联盟透过诉讼、推动立法以及社区教育达到其目的。该联盟成立于1920年，现拥有超过50万会员和超过1亿美元的年度预算。——译者注

② Nina Totenberg,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September 6, 2013. Nina Totenberg,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cy of Ruth Bader Ginsburg*, edited by Scott Dod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8 of draft; Totenberg apparently means Justice Stevens, who would have been the assigning justice if Rehnquist had voted for VMI. Stevens has no memory of the conversation (Justice John Paul Stevens, interview with author, July 21, 2014). Rehnquist ultimately concurred with the majority, so it may have been Justice Rehnquist whom O'Connor approached.

③ Linda Greenhouse, “From the High Court, a Voice Quite Distinctly a Woman’s,” *New York Times*, May 26, 1999; Lyle Denniston, “Justice’s Crusade: ‘We the People’ Includes Women—Ginsburg Led Military-School Ruling,” *Seattle Times*, June 27, 1996, <http://community.seattletimes.nwsources.com/archive/?date=19960627&slug=2336534>.

1996年6月的那一天，仿佛全美女性都来到了法庭。无论你是战斗在最高法院的律师还是全职妈妈，无论你支持还是反对堕胎，无论你未婚还是已婚，无论你有过性行为还是正准备奔赴一场贞洁舞会^① (purity ball)，在通往那一天的旅途中，抑或正在经历那一天，这两位女士改变了女人们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了男人们的生活。奥康纳与金斯伯格大法官在各类案件判决中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但本书只讲述站在司法权力顶端的她们，如何共同使女性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她们坚决主张男女平等，她们就是“男女平等”活生生的例证，并且，由于她们在女权运动结束前就已就任，所以她们还是推行男女平等的先驱。当女性被平等对待时，正如盖尔·柯林斯 (Gail Collins) 在其最畅销的书中说过的那句耐人寻味的话——“一切都在改变”。^②

1969年我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一个150人的班级中，包括我在内只有7名女生。毕业后，作为律所60位员工中唯一的女性律师，我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那时，我觉得法律世界是最不可能发生改变的地方。面试官毫不避讳地告诉我说他们不会雇用一个女人，他们也并不在乎我是否在法学院的《法律评论》工作过。7年后，当我为自己的第一个最高法院案子辩护时，我面对的是9位清一色的男性大法官。但从1967年数量可观的女性获准进入法学院就读开始，到1971年最高法院公布里德诉里德一案 (Reed v. Reed) 的判决——该判决部分得益于金斯伯格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所做的工作，世界开始改变。规定性别不平等的法律，就像那些关于女性生活的陈旧观念被摒弃，从成文法中删除。1981

① 贞洁舞会，是一种父亲和女儿参加的正式性的舞会。参加舞会的父亲承诺保证女儿的贞洁，直到结婚。用以维护年轻女孩心灵、身体和灵魂的纯洁。——译者注

② Gail Collins's excellent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is *When Everything Changed: The Amazing Journey of American Women from 1960 to the Present* (Boston: Little, Brown, 2009).

年，也就是金斯伯格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开启改革运动的十年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任命不见经传的亚利桑那州上诉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作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这次任命为美国女性平权运动树立了一个勇敢而坚毅的楷模。“成为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无妨”，奥康纳大法官在收到任命文件时说，同时她希望自己不是最后一个。

当她们为女性能够在法律及更广阔的领域取得成功而诉求，并凭借自身展示了这种成功的可能性，我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法律领域，我从一个异类变成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从业者。诚然，不能说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在法律职业中能够占到一定比例都是她们的功劳，但她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1982年，我第二次站在最高法院，奥康纳大法官回头看了看我。尽管她没有支持我的辩护，但我仍然很高兴她能够在那儿。当我作为一名法学教授和一名哲学家开始撰写关于女权运动的文章时，我将鲁斯·巴德·金斯伯格针对性别平等作出的轰动一时的引证纳入自己的分析中，作为第一手素材使用。

所有的运动都诞生英雄，而英雄通常备受争议。但她们是例外。她们当然并不完美，但奥康纳与金斯伯格大法官毫无疑问是女权运动的英雄。每个人都需要英雄。我通往最高法院的人生旅途开始于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上小学的时候。我在我们学校后面的小图书馆里找到了我的人生楷模。这个图书馆拥有许多适合女孩子阅读的人物传记类图书，这是我一生的幸运。弗拉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简·亚当斯（Jane Addams）以及撰写了共和国战争赞美诗的朱丽叶·沃德·华尔（Julia Ward Howe），还有帮助策划美国军事策略的安妮·卡罗尔（Anne Carroll）和露西·斯通（Lucy Stone）等女性权利论者。当读完苏珊·布朗内尔·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的故事，我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桑德拉·戴·奥康纳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是简·亚当斯和苏珊·布

朗内尔·安东尼的继承者。

xiv 抵达人生巅峰前，每个人都要经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程。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一案宣判的四十多年前，奥康纳只是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获得了一份法律助理的工作。1956年，金斯伯格到哈佛大学求学，法学院院长向她班里所有的9名女学生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她们要如何证明自己占据了本该属于男人的席位的合理性？在充满阻碍的四十年间，奥康纳与金斯伯格越过这个充满敌意的社会，到达了她们职业的巅峰。了解她们做了什么，又是如何做到的，就是在见证两条十分不同而又出奇相似的通往绚丽人生的道路。

奥康纳是在1981年被一位以压倒性胜利赢得大选的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而金斯伯格则是被一位在大选中选票甚至未过半数的温和民主党人推上大法官席位的。她们两个出身完全不同：一个是共和党人，一个是民主党人；一个是戈德华特^①的支持者，一个是自由主义者；一个来自亚利桑那，一个来自布鲁克林。金斯伯格，这个黑色头发，喜欢戏剧的纽约人，习惯称呼她的金发同事为来自西金区的女孩。^②奥康纳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金斯伯格已从事了十年的女权主义运动，那时她甚至不知道奥康纳是谁。^③

奥康纳和金斯伯格并不是性情相投的姐妹朋友。奥康纳，这个从不抱怨、坦率、开朗又充满活力的西部女子，在1981年被任命后很快就被她的同事们接纳。就像约翰·保罗·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

① 戈德华特（Goldwater），主张重新蓄奴、实行种族隔离，极端的右翼政客。——译者注

② Aryeh Neier,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uly 8, 2013.

③ Mike Sacks, "Women Supreme Court Justices Celebrate 30 Years Since Court's First Female," *Huffington Post*, April 11, 2012,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4/11/supreme-court-women-justices_n_1419183.html.

大法官 40 年后说的那样，“她从不抱怨或者要求什么特殊待遇。她总是能够按时完成她的工作，从不令我们失望。”^① 金斯伯格，这位才华横溢、孤独的女权主义运动呼吁者，一来到最高法院，就带来了她对于宪法坚定的看法和她一生在政治运动中所获得的丰厚经验。为了更好地钻研工作，她选择了与其他所有法官不同楼层的办公室。如果她没能从最高法院得到她想要的，她会通过国会或者利用媒体向公众呼吁。

但她们在最高法院却胜似亲姐妹。金斯伯格不知说过多少次，她 1993 年刚到最高法院，奥康纳来迎接她时，她有多开心。12 年后，当战友退休时，她又有多孤独。这是一部讲述两位拥有不同的背景，却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块神圣的土地上互相认可、惺惺相惜的律政姐妹的故事，正是她们完成了改变美国女性法律地位这项伟大的事业。

她们是怎么做到的？首先，她们都是律师出身。她们没有领导过一场传统意义上以游行或静坐的方式进行的社会运动。奥康纳唯一正式加入的“女权主义”组织是极其主流的女法官协会。^② 金斯伯格——女权运动中的瑟古德·马歇尔，也不是一个激进运动分子。在 1970 年充满传奇色彩的性别平权罢工运动中，人们没看到她的身影，实际上，她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游行。她几乎都活跃在专业领域内——面向女法官、女律师演讲，参加律师协会、法学院的重大活动，在《法律评论》上发表文章。出人意料的是，她在晚年成了当下最流行的媒体——互联网上人们的偶像。

xv

① Justice John Paul Stevens,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uly 21, 2014.

② “Sandra Day O’Connor—Member,” Iraq Study Group Report, Future of the Book, <http://www.futureofthebook.org/iraqreport/sandra-day-oconnor/index.html>; “O’Connor is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the State Bar of Arizona, the State Bar of California, the Maricopa County Bar Association, the Arizona Judges’ Association,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men Judges, and the Arizona Women Lawyers’ Association.”